

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 1950年印尼与中国建交前后*

陈衍德, 许振政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论述了印尼哈达内阁执政期间印尼与中国建交的国内政治背景、国际政治背景和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正处于从联邦共和国向印尼共和国过渡的这一政治敏感期, 使右翼的哈达内阁基于印尼的根本利益选择了与中国建交。但哈达的政治立场又使印尼对华关系摇摆不定。美国反对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使印尼当局受到巨大压力, 但印尼并未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印尼国内两派华人的对立, 对中印(尼)关系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 使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更加复杂。本文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的某些理论, 并依据历史事实, 力图对印尼领导人在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印尼对华关系; 政治背景; 哈达内阁

中图分类号: D83/87.3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9)03-0020-09

印度尼西亚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在东南亚各国中, 它的对华关系是最为复杂多变和跌宕起伏的。这与战后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国内政治的错综复杂和风云变幻, 其中又掺杂着某些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从外交是内政的继续这一传统观点来看, 印尼的对华关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内政治变动的结果。但考虑到印尼的特殊国情, 又不能不看到, 其外交与内政并不完全保持一致, 或者说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印尼独立之初就依违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 它既没有被美国拉入反共阵营, 又没有完全向左转, 应该说这是印尼国内各政治派别相互斗争和相互制衡的结果。与此同时, 在印尼政治领袖身上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结合, 也使得印尼的外交政策不时地出现左右摇摆的变化。在印尼的外交格局中, 与中国的关系居于重要地位。同为亚洲大国, 两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并开启了新的时代, 印尼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站在一起确实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 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导致各自的诉求并非完全一致, 甚至有较大差异。这也是印尼对华关系表现出不

* 收稿日期: 2009-06-14

作者简介: 陈衍德, 男, 福建厦门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振政,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确定性的重要原因。本文将从3个方面探讨1950年印尼与中国建交前后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国内政治因素、国际政治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和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之后将3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印尼对华关系的国内政治背景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与哈达共同签署的独立宣言虽然宣告了印尼的独立,但一直到1949年12月抗荷战争取得胜利后,印尼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这一段时期印尼政局的演变,深刻地影响到日后印尼的政治走向,并给其对外关系打上了烙印。“在这个时期里国家的内部分歧是多种形式的,而且是经常变换的。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中间的任何基本分歧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有在以独立作为直接目标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协议……武装斗争的势力和外交的力量彼此互不信任,却终于共同赢得了独立。”^[1]独立后的印尼是什么样一个国家呢?梅·加·李克莱弗斯认为:“看来有理由认为印度尼西亚并没有成为下列东西:它不是联邦国家,也不是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更不是荷兰的殖民地。”^[2]但是他的话并不完全正确。“圆桌会议”(1949年8-11月)产生的联邦共和国存在时间虽短(1949年12月至1950年7月),却留下了政治结构松散的遗产;虽然不是“伊斯兰教国”,却是实实在在的穆斯林国家;左派虽屡遭镇压,但力量犹存;荷兰人的影响亦未完全消失。西方学者评论道:“从革命中产生的这个独立国家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支离破碎,根本就无从找到一致。”其原因在于,印尼社会本来就极为缺乏一致性,“它是一个群体的、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分裂的策源地”,而独立战争期间,“政党之间的分歧、文化上的分歧、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及地域之间的分歧合在一起,产生了相互增强的作用”。^[3]这个大背景正是印尼建国初期国内政治混乱导致对外政策产生很大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

印尼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是发生在印尼联邦共和国时期,而不是在统一的印尼共和国诞生(1950年8月17日)之后。联邦共和国是由原荷兰控制地区与印尼独立力量控制地区共同组成的,并与荷兰结成松散的联盟。1949年12月27日荷兰正式将除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主权移交给它。其总统为苏加诺,副总统兼总理及外长为哈达。1950年1月11日,哈达即函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印尼联邦共和国已经成立。3月28日周恩来复函哈达,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尼建交。4月13日,哈达电告周恩来,印尼政府诚恳地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两国建交的意见,并欢迎互派使节。这一天便被视为两国建交的日期。这样,印尼成为继印度之后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二个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同时也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4]值得注意的是,给予总统很大权力的印尼1945年宪法,此间实际上已被搁置,苏加诺总统并未掌握实权,对外关系的决策与实施属于内阁总理的权限范围。印尼对华关系的顺利发展,不禁使人们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上右倾的哈达,在其主政时期为何如此迅速地实现了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如果说两面性或多面性是印尼政治人物的共性,那么独立初期政治局面的混沌不清便使这种两面性或多面性得到更为充分的表露。其实,绝对地认为哈达代表印尼右翼势力是失之于片面的。本来,将印尼政治势力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就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的情况下,这种划分更显得过于简单化。周南京教授曾对苏加诺与哈达进行了全面而充分的比较,指出两人既存在巨大差异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且哈达自身具备一些显著的优点,如他出任副总统兼总理期间,“廉洁奉公,传为美谈”。哈达与苏加诺在坚持民族独立方面,在“基本原则和国家基础结构方面”都是一致的。^[5]不可否认,哈达在印尼国内政治事务中的立场是坚决反共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外交事务中超越反共的立场。这也符合印尼独立后其外交与内政既同步又错位

的历史发展轨迹。

有学者认为,在印尼特定的国内政治现实中,其外交的作用有:(1)孤立国内对手的外部盟友;(2)为国内政治需要提供合法性;(3)实现个人政治技巧与手段效用的最大化;(4)炮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象征符号;(5)用以产生自豪、自尊,以及各种信心的心理;(6)成为衡量政府成功的标准以及反对批评的手段。因此,“外交成为掌控其发展的集团手中强有力的工具”。^[6]据此并结合当时印尼的政治现实,可以探察哈达内阁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动机。当时印尼各地仍很不安定,亲荷势力不时在各地发动叛乱,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势力也与此相呼应。新生的国家在稳定内部的同时,也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因为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有助于国内的稳定。新中国是值得印尼积极争取的对象。而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确实可以成为政府施政成功的一个例证,从而在议会民主制下避免或减少受到批评的机会。再者,为了淡化其给人的“右派”印象,哈达也需要以个人技巧来为自身塑造一个超越党派的公正形象。

从两国宣布建交的日期来看,正值印尼由联邦制转变为统一的共和国的前夜。由于“邦区”制度不得人心,一个推动国家实现真正统一的运动正风起云涌,各“邦区”纷纷解体。但由于哈达本人是一个联邦主义者,并不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以他的内阁多半是在人民的压力下才顺应统一潮流的。1950年5月,哈达内阁与仅存的苏门答腊邦和东印度尼西亚邦共同决定放弃联邦制,组成一个统一印尼共和国。^[7]在内政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外交成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4月中旬印尼与中国建交并非偶然,它是哈达内阁的国内政治需要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

然而,两国宣布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证明印尼当局仅仅把这一邦交关系看成一种“象征符号”,并没有从实质上推进两国关系的意愿。最有力的证据是,两国建交半年后印尼才派出驻华代办,而直到1953年10月才派出首任驻华大使。^[8]另一方面,中国的态度则是十分积极的。1950年5月31日,周恩来照会哈达,回应其互换使节的建议,并建议两国互派大使;6月9日,哈达内阁接受中国提名的王任叔为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9]反观印尼方面,虽然哈达首先提议两国互换使节,但终其任期印尼都没有派出驻华大使。再者,当王任叔大使及其一行于8月13日抵达雅加达时,印尼外交部竟未按外交惯例派代表迎接。而在此之前发生的拒绝中国外交人员入境一事,性质更为严重。7月22日,当持有印尼有效入境签证的16位中国外交人员抵达雅加达时,印尼当局竟然拒绝他们入境,经中方抗议交涉无效后,这些原拟组建使馆的外交官在船上等待了半个月之后,被迫于8月8日乘原船返回。^[10]这显然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惯例的外交事件,尤其不应发生于中国正组建驻印尼使馆之际。

上述事态表明,哈达内阁宣布印尼与中国建交仅仅是一种姿态,是出于其内政需要的一种政治手腕。可以说,哈达宁愿看到印尼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只停留在纸面上,而不愿意看到这一关系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固然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如美国的压力等,但更主要的恐怕是哈达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姑且将印尼的政治势力视为左中右三派,此时左派尚未复兴,代表“中间派”的苏加诺亦未掌握实权,故此二派对印尼的对外关系均未能产生主导作用。而掌权的右翼内阁不可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因此,与其说哈达内阁是“顶住”西方的“压力”而承认新中国,^[11]不如说它借此来标榜印尼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以此来与西方讨价还价。当然,这与前文从正面阐述哈达的动机并不矛盾,只有同时从负面也对其进行探讨,才能更加透彻地揭示哈达这一政治人物的两面性,也才能通过正反两个视角来探究此间印尼内政-外交的一体两面的矛盾运动。

二、印尼对华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27日荷兰向印尼联邦共和国移交主权,以

及次年8月17日真正独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的诞生,都是东亚民族民主革命的大事,并标志着本地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和印尼在各自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孙中山晚年形成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将亚洲各被压迫民族视为一体,希望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以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统治。^[12]苏加诺在其写于1928年的《印度尼西亚主义与泛亚洲主义》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并说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也是印尼人民的胜利。^[13]1945年9月,苏加诺在约见华人社会活动家洪渊源时指出:“中国和印尼都在进行同一斗争,即从自己的国土赶走帝国主义者。”苏加诺还说:“中国和印尼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半占领的国家,印尼要获得独立是很困难的,反过来,如果印尼仍然是一个殖民地,中国的独立是不稳固的。”^[14]既然如此,新的政权在中国和印尼相继诞生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走到一起就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恰在此时,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印尼复杂的国内政治背景又叠加了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遂使印尼的对华关系充满了变数。

在影响印尼对华关系的国际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因素。战后美国开始主导东亚政治格局,而其出发点则是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从东西方阵营的全球争夺这一视角来看待印尼国内的政治变化的。战后荷兰在印尼卷土重来,美国担心印尼人民的反抗导致这个国家向左转,并不积极支持荷兰。及至茉莉芬事件发生,美国认为这是印尼向右转的标志,反对荷兰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梅·加·李克莱弗斯认为:“也许最重要的是,共和国之战胜共产党叛乱,使美国基于对反殖民情绪的模糊同情,转而成为基于全球战略的外交支持……美国的战略思想现在被这样的思想所支配,即: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和苏联领导的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冷战’。在这个框框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表现了它是反共的,因此值得获得美国的支持。当荷兰人现在终于企图征服印度尼西亚时,他们发现美国在外交上反对他们。”^[15]

然而,印尼会遵循美国的意愿成为反共国家吗?即便如此,这就有利于印尼的抗荷斗争吗?“茉莉芬政变的失败,这就使美国增强了对苏加诺和哈达等非共产党人的信任感。然而,共和国内部的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他们抵抗荷兰的力量,同时鼓励了荷兰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日惹政府。”^①因此,对美国来说,印尼的反共犹如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美国增加一个新伙伴,因而巩固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又可能使印尼的独立之路更加艰难,从而破坏美国的战略意图。当然,印尼没有如美国所愿成为反共国家,抗荷斗争历时5年也最终获胜。这就使美国不得不因应印尼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政策。但无论如何,促使印尼全面向右转则是美国不变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美国当然反对印尼改善对华关系。

在哈达内阁尚未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前,美国进行了频繁的活动,试图迫使印尼政府不承认新中国而承认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曾在燕京大学担任院长的翰纳博士(Dr. Hanna)此时正掌管美国新闻处,他通过在印尼的燕京大学校友四处活动进行游说,并得到国民党“中央社”驻印尼办事处代表、燕大校友薛贤才的协助。^[16]当然这仅是后来披露出来的一个例子,更多的幕后活动尚不为人所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还利用其对印尼进行“援助”的承诺对印尼施加压力,企图影响印尼的对华关系。“美国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与它的政治目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不是纯粹地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回报或者寻找可观的经济前景。”^[17]因此,美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视受援国是否符合美国的政治标准而定。

事情的发展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印尼最终还是承认了新中国并宣布与其建交。为什么印尼会违背西方阵营的意愿去发展对华关系呢?除了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之外,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从个人因素来看,作为右派代表人物的哈达此间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这与他的经历有关。哈

① 印尼共和国政府在荷兰进攻下不得不将其所在地从雅加达迁往日惹。见尼古拉斯·塔林,第288页。

达与尼赫鲁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是“反帝同盟”的积极分子并且有过合作。两人先后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50 年代初的东亚形势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控制着中国领土,它代表的是过去时代的旧政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代表中国人民未来前途的政权,这个未来前途包含着新的希望与新的可能性,可望它利于亚洲人民实现完全独立的发展。”^[18] 形势比人强,任何政治派别的人士只要是明智的话都会顺应潮流。从国家因素来看,当时印尼正催促美国兑现其援助的诺言,而“援美”却迟迟未到。如前所述,美国还在观望,看看印尼是否真的向右转。这使印尼感到失望。^① 国家利益也促使印尼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身上。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而且这还与印尼对华关系的摇摆性大有关联。众所周知,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 1950 年 1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美国不准备武力帮助蒋介石“保卫”台湾的讲话。^[19]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声称“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亦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20]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改变了政策,以武力介入了台海地区,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进入全面对抗时期。如果说此前美国在印尼对华关系方面尚未施加足够强大压力的话,那么此后这种压力就陡然加大了。这从印尼对华关系在短短几个月内由热变冷可以得到证明。两国于 1950 年 4 月建交后,七八月间中国外交使团却在印尼遭遇种种麻烦。这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难道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由此可见,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分界线,美国对印尼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态度产生了程度上的变化。此前印尼尚能自主行事,此后则渐渐倾向于美国,尽管它并不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做。

另一个影响印尼对华关系的外部因素是荷兰。有学者在论述中印(尼)两国建交前后的关系时说:“由于印尼当时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受荷兰控制,美国也试图把印尼纳入其势力范围,以致影响了印尼政府的对华政策。”^[21] 其中关于荷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在反荷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即使在联邦共和国时期,印尼的对华政策也不可能受荷兰控制,遑论 1950 年 8 月印尼共和国重新确立其独立主权的地位之后了。倒是荷兰处处受制于美国,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因为美国不认为荷兰能使印尼获得稳定,并且希望印尼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可靠盟友。荷兰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虽然它可以顶住这方面的压力,但来自美国的压力却是它无法承受的。^[22]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深信海外冒险正在耗尽荷兰的潜力,削弱荷兰国内重建及其对欧洲稳定做出贡献的能力;美国不仅拒绝在东南亚援助荷兰甚至威胁要停止提供马歇尔援助给荷兰的重建计划”。^[23] 在欧洲成为东西方阵营争夺重点的情况下,美国只能压荷兰在印尼退却。在此形势之下,荷兰如何能有效地制约印尼对华关系的发展呢?

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对中印(尼)两国关系的变化就毫无影响力了。1958 年年初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对印尼反荷斗争的态度,是荷兰统治者一向关心的事情。”报告说,荷兰方面认为,印尼“是一面争取中国的支持,一面又争取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西德)的支持。估计中国由于本身力量并不十分充沛,要全力支持印尼也是困难的。所以,荷兰应该利用这种空隙……促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挥一些影响,以牵制中印(尼)关系的发展。这对荷兰是有利的。”^[24] 这份报告虽然写于 50 年代后期,但对于分析 50 年代初印尼对华关系中的荷兰因素还是有用的。荷兰的政策是否为前一个时期的延续?答案是基本如此。因为中国支

^①“美援”除了政治条件之外,还有一些经济上的条件。萧玉灿说:“印尼希望得到的是无条件的援助,而在印尼联邦共和国时期所取得的却是美国进出口银行年利率百分之六的 1 亿美元商业贷款。这种商业贷款显然不是无条件的。其条件将影响印尼的建设方向。”参阅萧玉灿(注释 11),第 186 页。

持印尼反帝反殖的政策一直未变,虽然荷兰与美国在印尼本国问题上的立场有分歧,但在印尼对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则是一致的,那就是持反对态度。然而荷兰对印尼的影响力持续下降,荷兰因素在中印(尼)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显得并不重要,尤其与美国因素相比更是如此。

三、印尼对华关系中的华人因素

华人因素是印尼对华关系相关诸因素中最难以评判的因素。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印尼华人社会本身是分裂的,两派华人对印尼对华关系所起的作用正好是相反的;二是印尼政府将其对华关系与国内的政策加以区别,从根本上说并未将二者联系起来,但在它需要的时候又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在此复杂的情况之下,如何评判华人因素的作用?它对印尼对华关系的作用究竟是正面的推动还是负面的牵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显然,这些都是难以一概而论的。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印尼华人约占印尼总人口的2%至2.5%^①，“他们又散居在印尼成百上千的大、小岛屿的城镇及穷乡僻壤与山芭之中,并与300多个印尼民族杂居,处在他们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25]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人为地制造了华人与土著民族的隔阂与矛盾,使华人经常陷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之中。在印尼抗荷战争期间,华人又被分割成荷占区与共和国占区两个部分。在共和国政府倡导下,1946年9月17-19日在日惹成立了中华总会中央筹备委员会。然而,1948年5月23日在荷兰统治区又成立了名为中华协会的组织。抗荷战争期间华人经常无缘无故地遭到屠杀,社会秩序的混乱迫使荷占区华人组织保安队以自我保护,然而这又被某些人指责为帮助荷兰殖民军对抗共和国。所有这一切表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地位确实非常脆弱”,“因为他们无意进行殖民统治和掌握政权,以致他们无意捞取权力并且总是受到虐待”。加上所有的华人都被视为富有者,从而“把华人逼入困境以致容易成为抢劫的受害者”。^[26]

尽管如此,许多华人还是在印尼的独立运动中表现出色,因此在印尼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华人的政治地位似乎有所提高。“当1945年8月29日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成立时,有7名华人代表当选为委员”。^[27]在1947年7月3日成立的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中,“有两名华人即萧玉灿代表华人集团任国务部长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王永利博士任财政部长”。^[28]然而,少数华人精英既无法从整体上代表华人,甚至可以说只是政治装饰品,对华人处境的改善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一直延续到联邦共和国时期。而恰在此时,两种政治倾向的华人之分裂公开化了:倾向于新中国的华人与倾向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华人阵线日益分明,对立日益激化。

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在印尼进行了长期的苦心经营,在印尼华人中已具备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据国民党海外党务资料统计,至1949年,印尼及帝汶的国民党党员达41584人,位居海外各国各地区之首。^[29]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使海外华人中原本就存在的进步力量正式团结在一起,在各国各地区形成了拥护新中国的华人群体或派别。印尼华人也不例外。这一新生的华人政治派别借助新中国诞生的强大冲击力,在印尼华人中努力争取中间派,并对保守的华人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国民党在印尼华人社会中的基础稳固,相当多保守的华人仍奉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为“正朔”并继续效忠之。尽管保守的华人开始出现分化,但他们很快稳住了阵脚,并与进步的华人展开竞争。这样,两派华人的对立使原本就非铁板一块的华人社会更加四分五裂了。

① 据1930年荷属东印度的人口调查,华人为1233214人,约占荷印总人口的2%。又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估计,1956年印尼华人为250万左右,约占印尼总人口2.5%。见“印度尼西亚华人口、分布国籍等情况的数字估计”,《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978-06,1958年6月1日。

这样一种状况从整体而言对印尼华人社会并不十分有利,尽管华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表现,但两派的对峙所产生的内耗毕竟使华人社会无法一致对外。从印尼华人与印尼对华关系二者的关联来看,虽然进步华人对中印(尼)两国关系的推动有一定实效,但也被保守华人的牵制部分地抵消了。再者,印尼政府也得以利用这种状况来操控华人因素与对华关系二者的互动效应,以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进步华人对新中国的倾向性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华人的抵制。例如,1949年12月27日荷兰向印尼联邦共和国移交政权当天,创办进步报纸《生活报》的黄周规就在报社同时升起印尼国旗和新中国国旗。这引起了保守华人的惊恐,并引来军警干涉,试图强迫降下中国国旗。黄周规团结报社同仁并联合其他进步华人据理力争,中国国旗才依然飘扬。^[30]从策略上看这一做法虽非十分得当,但它毕竟表达了进步华人对新中国的向往。实际上这一行动也寄托了对印尼政府尽早承认新中国的希望。另一个例子是,长期支持并参与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林群贤,“在哈达内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二者间该承认哪一个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进行抉择时,他表现得非常活跃,积极同许多老战友联系,说服他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保守华人在获悉此情况后与印尼右翼势力一起对其进行秋后算帐,利用1951年苏基曼内阁发动的“8.16”大逮捕之机,把他列入黑名单并加以监禁。^[31]合法的政治游说却使他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斗争,这也说明,进步华人推动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有时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

除了以个人行为推动印尼对华关系的发展,进步华人还以群体行为来为中印(尼)关系的发展造声势。1950年1月5日,雅加达、井里汶、泗水等39个进步华人社团,分别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和苏加诺、哈达,吁请尽快建立两国邦交,促进两国友谊。印尼各地进步华人纷纷签名响应,开展促进两国建交的运动。^[32]由追求民主进步的华人组成的“民生社”,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民生社”创立者黄周规、杨新容等人,联合司徒赞、张国基、洪渊源等华社名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以杨新容为主席的“促进中国与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33]该委员会成为促进两国建交运动的领导核心。

那么,在印尼与中国建交这件事上,印尼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华人因素呢?对此恐怕不能有过高的估计。实际上,在进步华人公开表达对两国建交的愿望之前,印尼领导人就已经准备与中国建交了。早在1949年10月初,率领印尼代表团在海牙参加圆桌会议的副总统哈达,遇到正在海牙采访的《新报》社长洪渊源时就对他说:“印度尼西亚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要求中国予以承认”。^[34]是否可以说,进步华人是在了解到印尼领导人的建交意向之后,才大张旗鼓地开展促进建交运动的?完全可以这样推论。再者,尽管进步华人和印尼政府在与中国建交这件事上进行了良性互动,但华人因素毕竟不是印尼与中国建交的原动力。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与其国内的华人因素相关度并不高。

这一点也可以从华人社会两派的相互牵制、两种作用力的相互抵消得到部分印证。尽管进步华人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保守华人相比,尚未占优势。在社团方面,3个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中华总会、中华商会和亚弄公会(华人零售商同业组织)——均掌握在保守华人手中。在学校方面,两派大致势均力敌。在报刊方面,由于进步华人创办的报刊较多,显得较有声势,但保守华人的报刊历史较长,影响力仍然存在。在印尼各地区两派力量的对比上,雅加达的进步华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占绝对优势,但因其组织性较强,活动频繁,因而显得声势浩大。而雅加达以外地区,如泗水、万隆、巨港、坤甸、三宝垄等地,保守华人的力量更加强大。^[35]所以,进步华人时时受到保守华人的制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在此情况下,很难说进步华人推动建交的运动有多大的实效。

及至印尼与中国建交后,哈达内阁主导的对华关系不进反退。这当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守华人的影响?虽然印尼政府断绝了和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撤销了其驻印尼各地的领事馆,但是

“国民党在印尼各地的支部,如坤甸、泗水、三宝垄等地的支部,还可以合法、公开地挂牌存在”。^①这是印尼右翼势力在玩弄法律承认和实际承认的两面手法。更有甚者,哈达于1950年6-7月间在国会所作的外交政策秘密报告中,竟然主张台湾独立并从中国脱离。^[36]从哈达的私人交往中,也可以看出他与一些国民党人士关系密切,如曾经担任“国民政府驻印尼副总领事”的朱昌东即与哈达过从甚密,中印(尼)建交后,哈达还表示朱氏可继续居留印尼,并免费发给他正式居留准证。^[37]种种迹象表明,此间印尼当权者与保守华人的关系远超过他们与进步华人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保守华人对他们的影响超过进步华人,如此显然对印尼对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

当然,印尼领导人在对华关系上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并不会受华人两派中任何一派的支配。相反,华人因素却可以成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华人社会的分裂易于被其所利用。印尼政府对其国内华人的政策不会与其对外政策(主要是对华政策)相混淆。虽然二者有时会相互影响,但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不会受制于对国内某一移民群体的政策。就华人因素对印尼对华关系的作用而言,显然它具有两面性,即正面的推动与负面的牵制。在中印(尼)两国关系的发展方面,既不能完全忽略华人因素,也不能对它有不切合实际的评价。

四、综合分析

首先,分析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二者在印尼对华关系决策中的孰轻孰重。根据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Polyheuristic)理论,决策者在认知阶段采用的是基于维度(decision-based)原则和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原则。前者指决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一般是政治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后者指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不能用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来补偿。^[38]对于印尼领导人来说,取得民族独立的初始阶段决定了政治因素高于其他因素,特别是在联邦共和国向真正独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过渡时期,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因素。如果不与中国建交,政治上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此前印度已率先和中国建交,力争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旗手角色的印尼,自然不能落后。而接受有条件的“美援”从而在经济上获益,能否补偿与中国没有邦交关系的损失呢?显然不能。美国虽然反对荷兰重新统治印尼,但它毕竟是西方集团的首领,不可能站在反帝反殖的立场来考虑印尼事务,而与美国过于亲近也有损于印尼意欲塑造的国际形象。所以印尼决策者否定了不与中国建交的方案,同时也否定了经济上过于依赖美国的方案。因此,综合印尼国内外诸背景性因素,政治因素在其对华关系决策中显然重于经济因素。

其次,分析文化因素。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力,观念则无足轻重。但“建构主义则根本认为,信仰、规范、观念等文化内容,建构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39]观察1950年的印尼,其外交路线虽尚未完全定型,但其民族文化的背景及其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规范了这一新生国家未来的外交走向。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苏加诺的思想并未绝对排斥共产主义^[40],而哈达与苏加诺的分歧主要基于内政而非外交。印尼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大于它与东方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这就是美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印尼发展对华关系的深层文化背景。还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反观其源流与动因。苏加诺掌权时期印尼与中国的接近自不待言。即使是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上台执政,在印尼显示出接近西方的外交路线的同时,也还要竭力维持本国在第三世界集团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爪哇文化中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

① 蔡仁龙教授是印尼归侨,20世纪50年代印尼华人进步组织的积极分子,对当时的印尼国内局势有切身体会。回国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70年代起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院)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对印尼华侨华人的研究尤其深入,有许多学术论著发表。陈衍德、许振政:《蔡仁龙教授访谈纪录》,厦门,2007年11月5日。

观念之反映。有一系列现象值得深思。苏加诺可以一面与中国发展亲密关系,一面又在国内排华(主要从经济上排斥华人);苏哈托则可以长期冷冻对华关系,但在国内却以利用加限制的方式对待华人(给华人以相对宽松的发展经济的环境)。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经济交互动中,是否有一种维系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文化纽带在起着某种平衡作用呢?

总的来说,制约印尼对华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印尼国内政治因素居于首位,其次是国际政治因素,其中美国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才是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虽然华人因素在诸因素中最不具重要性,但在华人分歧的背后又牵涉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台海两岸局势又间接地与美国有关。所以,华人因素的重要性虽排在印尼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因素之后,但却是最为复杂的。概而言之,1950年中印(尼)两国建交前后这一段时期,印尼对华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以上3个因素的合力之结果。

印尼独立之初,强大的中央集权远未建立起来,其历史文化中固有的分散性和多样性也正处于整合的初期阶段。出生于苏门答腊的哈达,与后来长期执政的苏加诺和苏哈托有很大不同,后二者都是爪哇人,深受爪哇文化浸染,都是中央集权的强烈支持者。而在荷兰接受过教育的哈达,倾向于分权的联邦主义(尽管他们3人都是维护印尼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者)。两种不同思想指导下的政府体制,其对外政策自然有所不同,哈达主政期间印尼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便由此而来。然而在议会民主制纷繁复杂的党派斗争中,哈达内阁能使印尼与中国建交,亦属难能可贵,尽管哈达未能完成派出驻华大使的任务。中印(尼)两国建交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形势下,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的印尼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无论如何都对中国有利。尽管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中印(尼)新关系的航程已经启动,此点应该铭记。本文揭示了印尼对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负面因素,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求真求实的探索,并不是要否认两国关系缔造者的历史功绩。在本文结束时,对此特予以说明。

注释:

- [1][2][15][17] 梅·加·李克莱斯著,《印度尼西亚史》,周南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86、318、313、379页。
- [3][23]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2卷,王士录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2、334、291页。
- [4][8][21]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0、111、111页。
- [5] 周南京:《苏加诺与哈达比较研究》,载周南京:《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325、334页。
- [6] 唐:《印尼外交政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24—25页。
- [7] 孙福生:《印度尼西亚政治史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 [9][32] 生活报社编:《生活报十周年纪念刊》,雅加达,1955年,第161—162、161页。
- [10] 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102页。
- [11][16][18][31] 萧玉灿著:《五个时代》,黄书海等译,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2年,第185、185—186、185—186、201页。
- [12] 陈衍德:《亚洲觉醒的先声——菲律宾1896年革命及其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载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52—53页。
- [13][40] Sukamo, “Indonesianism and Pan-Asianism, Sukamo, Under the Banner of Revolution”, *Yayasan Bung Karno*, Jakarta, Vol. 1, 2005, pp. 67-71, 14-22.
- [14][34] 洪渊源著:《洪渊源自传》,梁英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142、184—185页。
- [19][20] 资中筠、何迪主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265页。

- [22] Cliver J. Christie,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8, p. 185.
- [24] 《荷兰政府对印尼反荷斗争的态度及各方面的反映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110—00788—02, 1958 年 1 月 8 日。
- [25] 蔡仁龙:《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年,第 229 页。
- [26] [28] 许天堂著:《政治漩涡中的华人》,周南京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19、574、533、522 页。
- [27]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 1949 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437 页。
- [29] 杨建成:《从统计数据试论中国国民党迁台初期的海外工作,1950—1963》,第二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香港大学,1994 年 12 月。
- [30] [33] 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出版时间不详,第 25、37 页。
- [35] 《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关于印尼华侨概况的报告》,《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118—00124—06, 1950 年 9 月 3 日。
- [36] 《具报印尼政府对我国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 118—00124—06, 1950 年 12 月 21 日。
- [37]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北京:华侨问题研究会,1955 年,第 69 页。
- [38] 韩召颖、袁维杰:《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外交评论》2007 年第 6 期,第 76—77 页。
- [39] 俞新天主编:《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23—24 页。

[责任编辑:邵 鸣]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around 1950: Background in Indonesia

CHEN Yan-de XU Zhen-z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April 1950,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established. Thi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t home and abroad in Indonesia, as well as the factor of Chinese in this country. Hatta's cabinet seems to be a government of right wing, however it made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Indonesia. Neverthel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were not stable. US opposed Indonesia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China, Indonesian government was pressed by US, but it did not obeyed US perfectly. Meanwhile, the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Indonesia was divided, and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were affected by this situation. The author analyses and comments the issues above.

Key words: relations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political background, Hatta's cabinet